

以安顿生命为目标的研究方法

——卡洛琳·艾理斯的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

卢崑诩

提要:卡洛琳·艾理斯是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主要开创者。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艾理斯将研究方法的核心问题从“怎样获得科学与客观的知识”转为“如何帮助研究者自身以及读者过着有意义、有用、符合道德伦理的生活”。以“叙事真实”和“生命连贯性”为理据,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让研究者在讲述自己遭遇的人生危机事件的过程中,透过向内反观自我的矛盾和纠结来揭示塑造与限制自我的社会结构,同时达到解放与重塑自我的效果,并且产生唤起读者情感共鸣、启发读者心灵和转变读者生活方式的作用。面对国内正在迅速扩张的实证主义“洋八股”学风,艾理斯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也可能刺激国内学者反思与深化自身对于西方诸多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认识。

关键词: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 后现代主义 叙事真实 生命连贯性 研究方法

自传民族志(auto-ethnography)是一种结合了“自传”(autobiography)与“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作为质性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新兴类型,它正逐渐被西方社会学以及社会学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们接受和采用。有关自传民族志的论文陆续在不同的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其中不仅包含对后现代主义特别友善的刊物《质性调查》(*Qualitative Inquiry*),也包括原本偏好传统写实主义的期刊《当代民族志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以及《质性社会学》(*Qualitative Sociology*)(Anderson, 2006: 337)。此外,《运动社会学杂志》(*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在2000年第1期以专刊方式刊登了数篇自传民族志的文章。《当代民族志杂志》则在2006年第4期邀集多篇论文针对自传民族志的未来走向展开辩论。《文化与组织》(*Culture and Organization*)在2007年第3期以专刊讨论组织的自传民族志研究。《研究实践杂志》(*Journal of Research Practice*)也在2010年第1期以专刊推荐自传民族志方法。《质性传播研究》(*Qualitative Communication Research*)更在2012年第2期以专刊

探讨自传民族志对传播研究的用处。

安德森和奥斯汀认为自传民族志可以被区分成“分析式”(analytical)与“情感唤起式”(evocative)两种典型(Anderson & Austin, 2012)。分析式自传民族志与传统的写实主义民族志差别不大。研究者先让自己成为某一文化群体的资深成员,然后以自己的亲身经验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对之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有关此一文化群体的理论(Anderson, 2006)。反之,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在研究目标与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皆与传统的写实主义民族志大异其趣。研究者在述说自己的故事(通常是人生中的意义危机事件)的过程中,透过向内反观自我的情感、思想、对话、行动当中的矛盾和纠结来揭示塑造与限制自我的文化模式及社会结构,同时达到解放与重塑自我的效果,并且产生唤起读者情感共鸣、启发读者心灵和转变读者生活方式的作用。

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标志着一群社会学家,在严肃地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于科学与客观知识的强烈批评之后,重新定位社会学研究目标与方法的努力。卡洛琳·艾里斯(Carolyn Ellis)正是此项新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她将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怎样获得科学与客观的知识转向如何帮助研究者自身以及读者过着有意义、有用、符合道德、符合伦理的生活。

面对国内正在快速成长的实证主义“洋八股”学风(彭玉生, 2010),艾里斯的研究方法显得格外地发人深省。仔细探讨艾里斯的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能让我们认识西方社会学研究方法中一种挑战主流的新型尝试,也能刺激我们反思与深化自身对于西方诸多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解。带着这样的想法,笔者将回顾艾里斯由写实主义民族志转向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心路历程,梳理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理据、目标、评判标准、操作方法以及伦理顾虑,指出其他学派对艾里斯研究方法的批评以及艾里斯研究方法的宝贵价值。

一、艾里斯的丧亲遭遇与研究方法转向

艾里斯最早学习的研究方法是多数符号互动论学者所支持的写实主义民族志。1974年,艾里斯成为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SUNY Stony Brook)的研究生,并且进行渔村的民族志研究。1970年代的质

性研究强调步骤明确的方法以及理论生产。格拉斯(B. Glaser)与斯特劳斯(A. Strauss)的《扎根理论的发现——质性研究的策略》(*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一书是当时质性研究方法的圣经。此书提供了一整套看似严格且系统的方法帮助研究者建造理论。当时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揭示了跨越时空限制的一般性社会过程的民族志研究才是好的研究。因此,艾理斯选择的论文主题是两个孤立渔村的比较研究。她以自认为客观的、保持距离的方式,不带感情地记录自己在田野中的所见所闻。然后,分析两个渔村中的社会组织与变迁、工作与家庭的相互影响。最终提出一个有关“松散”与“紧密”家庭结构的理论(Ellis, 1986)。由于标榜科学与客观,当时的质性研究方法并不重视研究者在田野中的情感经验。一般的研究指南只教导研究者如何在田野中行动才能无偏见地搜集资料并且不伤害被研究群体,惟有在讨论研究者如何处理田野中的压力时,才会提及研究者的情绪。研究者的其他情感则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合法的(Ellis, 2004: 9 - 15)。1981年,艾理斯获得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学术职位。随后,她与丈夫合作进行一项有关嫉妒心的研究(Ellis & Weinstein, 1986)。此时,两人依然崇尚科学与客观,所以他们使用的研究方法混合了量化调查与质性访谈(Ellis, 1997: 124)。

1980年代中期,艾理斯个人生活中接连的丧亲遭遇使她的研究兴趣开始由写实主义民族志与量化调查转向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艾理斯在事后回忆时表示:

若不是在我人生的早期就遭遇了丧亲之痛,一种传统社会科学无法帮助我了解和处理的深刻痛楚,我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探索这些为了另类的目标而进行的另类的书写方式。(Ellis, 1997: 135)

1982年,艾理斯的弟弟在前往南佛罗里达拜访她的途中不幸死于坠机。与此同时,她丈夫的慢性肺气肿也进入了晚期阶段。这样的生活变故让艾理斯觉得手边正在进行的有关人们嫉妒心的科学调查已经不重要了。她迫切地渴望了解和处理自己的强烈情绪——骤然失去弟弟的极度悲伤以及眼见丈夫健康快速恶化的巨大痛苦。到了丈夫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1984 - 1985年),艾理斯开始每天在笔记本中写下自

己的想法和感受、自己与丈夫的对话以及每天发生的事情。对于艾理斯而言,写笔记具有三种意义。首先,写笔记带来治疗的效果。书写的过程帮助艾理斯整理自己的生活,厘清正在发生事件的意义,然后放下这些事件和情绪以便面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其次,艾理斯想要运用社会学知识分析自己的遭遇和处境。另外,她也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成为其他人的参考,帮助其他人更好地理解他们自身的经验。因为这样的“陪伴”正是她在此极端时期所渴望获得却又很难找到的(Ellis,2004:18-19)。

在这段非常时期,艾理斯经常反复地阅读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以及许多以第一人称书写的患病经历。这些文学作品与真人故事给艾理斯的生活带来了意义和慰藉。这样的意义和慰藉是她在科学的社会学报告中找不到的。艾理斯以为主流的研究方法在情感这个领域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大多数研究情感的学者依循着“理性行动者”的取向进行研究。他们忙着观察视频画面里脸部肌肉的收缩、计算和预测情绪反应,并且从活生生的情感经验中抽取一般化的理论。情感被化约成理性行动者模型中的一个附加变项,而人们活生生的情感经验与交流则消失不见了。经历丧亲之痛却又无法在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成果中得到洞见和抚慰,使艾理斯开始质疑为什么社会学不能变得更像文学一些?艾理斯开始尝试连接社会学与文学、学术兴趣与自身遭遇、情感与理智、社会结构与个人生活。她发现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是达到这些目标的最好方法(Ellis,1997:117、126)。

丈夫去世后不久,艾理斯开始撰写《最后的协商:一个关于爱、失去和慢性病的故事》一书(Ellis,1995a)。此书以艾理斯的笔记以及回忆为材料,以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为方法,述说丈夫的肺气肿疾病与两人关系之间的交互影响。为了厘清她与丈夫的互动对于艾理斯本人的意义,也为了让片段的笔记和回忆转变成头尾完整的故事,艾理斯花费了9年的时间反复地修改她的作品。这本书不再崇尚科学,而是强调述说故事是一种自我探索的过程;不再追求再现客观事实,而是尝试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从一开始创作此书,艾理斯就打破了许多被一般学者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学研究规范。她抛弃了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区隔,以自己为研究对象并且用第一人称书写。她违反了传统研究对跨越个案的一般化理论的追求,将研究焦点对准单一个案。她模糊了社会学与文学的界线,采用述说故事的文体书写。她打破了将

社会生活描绘成一张时间冻结的照片的标准研究习惯,刻画她与丈夫随着时间不断起伏的关系。她挑战了主宰社会学的理性行动者模型,展现通常被隐藏的私人生活与强烈情绪(Ellis,1997:126-127)。

艾理斯认为:述说故事的目的是为了还原过去的事实,而是为了厘清事件对述说者的意义。通过述说自己的故事,我们体认到过去的意义始终是不完全的和暂时的。我们会根据现在的处境以及未来的计划而修改过去的意义。艾理斯刻意在作品中保留了不同版本的事件描述,并且呈现出每一次以不同方式反省过去时产生的不一样的自我感觉。她在书中展示错综复杂的自我感觉,呈现矛盾及爱恨交织的心情,藉此让读者进入她的情绪感受,看见她如何在揭露自己内心脆弱面的过程中治疗自己、重建自我认同。艾理斯期待读者在进入她那情感丰富的故事的同时,也会想起读者自己的故事。她希望读者不仅仅体验到她的特殊遭遇,而且也感受到人类经验深刻的内在关连(Ellis,1997:129-131)。

二、后现代氛围下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 理据、目标与评判标准

艾理斯能够成为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重要创建者,不仅仅因为她的个人遭遇、胆识与才华,还因为后现代主义的传播削弱了传统科学主义在社会学及社会学相关学科的权威,从而开启了创造新型研究方法的空间。库恩(T. Kuhn)的科学史研究挑战了“科学是逐步累积客观知识”的观点。罗蒂(R. Rorty)的哲学则展示语言词汇与科学事实建构的紧密关连。利奥塔(J. F. Lyotard)更打破学者对于统一的整体知识的信仰以及对于宏大叙事的追求。后结构主义者巴特(R. Barthes)、德里达(J. Derrida)、福柯(M. Foucault)改变了人们看待“作者—文本—读者”关系的方式。后现代人类学家格尔茨(C. Geertz)、克利福德(J. Clifford)、马库斯(G. Marcus)、菲希尔(M. Fischer)解构了传统写实主义民族志的写作惯例,指出科学与文学书写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女性主义理论家克拉夫(P. T. Clough)、哈丁(S. Harding)、哈尔特索柯(N. C. M. Hartsock)强调边缘化的立场以及女人的特殊性。跨界文本研究者千印(T. M. Trinh)、安扎尔朵(G. Anzaldúa)、贝哈(R.

Behar)鼓吹反身性、脆弱性、实验性书写。在众声喧哗的学术气氛中,艾理斯以及其他一些研究者开始打造自己属意的研究方法——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Ellis,2004:17-18;Ellis & Bochner,2000:735)。

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核心理据是“叙事真实”(narrative truth)。叙事真实强调经验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对于某一经验的两种不同的叙事虽然可以互相比较和竞争,我们却无法以“经验本身的意义”为判准来衡量两种不同叙事的真实程度。经验的意义是在叙事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生活和叙事紧密相连。目前的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期望会影响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解释;对过去事件的解释又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目前的生活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叙事不仅仅关于生活,而且还是生活的一部分(Ellis & Bochner,2000:745-746)。

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另一个重要理据是“生命连贯性”(the continuity of life)。生命连贯性意指人们天生就渴望自己的生命经验具有连贯性。因此,我们时时刻刻都生活在一种张力之中。这种张力的一端是我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另外一端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期望。在每一个当下,我们都会努力地解读自己的遭遇,让过去与未来能够衔接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个衔接过去与未来的意义连续体让我们获得自我认同感。自我叙事作为一种方法,使我们得以将有时候破碎了的生命经验重新粘连在一起。我们的自我认同感就建立在我们所述说的故事之上。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我们的故事是否像一面镜子那样精确无误地反映出我们的过去?问题的重点在于:我们的故事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我们的故事让我们成为怎样的人?我们的故事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哪些新的可能性?自我叙事是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诉说自己的故事,我们让自己成为故事中的那个人(Ellis & Bochner,2000:746)。

以叙事真实和生命连贯性为主要理据,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一方面指出传统的科学社会学过于狭隘,另一方面则替社会学研究设定了全新的目标。艾理斯认为传统的科学社会学以非常狭窄的标准定义社会学研究。此一定义偏好说理而非感觉、偏好理论而非故事、偏好抽象而非具体、偏好专业术语而非平易近人的文字。她希望社会学研究者能够勇于质疑和挑战传统社会学的潜规则:为何社会学不能充满关怀与同情?为何社会学不能以自我发现、自我创造、自我治疗为主轴?为何社会学研究者不能公开自己的主观感受,而必须假装客观中立(Ellis & Bochner,2000:746-747)?

看清了传统社会学的偏狭之后,社会学研究者就可以大胆地尝试完全不同的新目标。艾理斯呼吁:社会学是可以和人们的日常经验直接相连的;社会学可以是有魅力的、唤起人们情感的、个人的、反身的、具体的、有治疗效果的、能帮助他人的(Ellis,1997:120)。她认为社会学的目标是沟通意义而非描述世界。生活是一个持续创造的过程。生命意义的连续性总是不停地被突发的意外事件打断或阻碍。我们必须透过叙事和自己沟通也和其他人沟通生活的意义。社会学的目的是鼓励同情与对话,我们的故事让我们能够与自己交谈、与读者交谈。就与自己交谈而言,我们揭露自己的脆弱面、困难、选择、价值。我们审视自己的不确定感、矛盾的情绪、多重的自我感觉。我们展示自己如何挣扎着重建自我认同,使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获得连贯的意义。我们的故事成为我们了解自己的媒介。就与读者交谈而言,我们的故事邀请读者设身处地地感受我们的遭遇,鼓励读者从他们的立场和我们展开对话。故事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抚慰有类似遭遇的读者,刺激他们自我反省与改变。它还能够拓展无类似遭遇的读者的生命体验,增加他们同情别人的能力。读者成为我们生命故事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冰冷知识的被动接受者(Ellis et al.,2011:280;Ellis & Bochner,2000:748)。

总之,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试图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创造出一种不同于传统写实主义民族志的新关系。它将焦点放在:人们如何在充满不确定与挑战的世界中努力地过生活、人们如何解读自己的经验、人们如何做出道德与伦理的抉择。它也运用社会学知识探讨那些限制人们解读方式与抉择的文化模式及社会结构,并且显示人们如何可能逾越那些束缚人的模式与结构(Ellis,2002a;Ellis & Bochner,2000:743-744)。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要让社会学知识向学术界以外的听众开放,要让社会学变得对一般人也有亲和力与直接影响力(Ellis,1997:134)。

由于理据和目标不同于传统的写实主义民族志,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评判标准也与传统的标准相异。虽然艾理斯同样建议以可靠性(reliability)、有效性(validity)、一般性(generalizability)为标准来评判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作品,这三个评判标准在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脉络中的含义与它们在传统的写实主义民族志脉络中的含义却非常不同。“可靠性判准”针对作者的可信赖程度(credibility):作者是否说了一个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如果作品是以“虚构小说”而

非“真人真事”的形式表现,那么作者必须提出充分理由来说服读者这样做是必须的。“有效性判准”针对作品产生的效果:作品能否让读者觉得故事的内容是生动的、真诚的、可信的;故事能否帮助读者了解其他人;故事能否帮助作者本人和受访者改善生活。“一般性判准”则针对读者的反应:作品能否唤起读者的共鸣,使他们想起自己的处境或自己所认识的人的处境(Ellis et al., 2011:282-283)。

三、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操作方法与伦理顾虑

如前文所言,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结合了“自传”与“民族志”的特色。研究者一方面要求自己的作品具备自传文学的美感、唤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另一方面又试图对自身所处的社会进行民族志的深描与分析(Ellis et al., 2011:275、277)。

研究者通常在作品中回顾自己的某些“重要的生命转折”(epiphanies),呈现自己如何遭遇意义危机事件,如何重新诠释自己的遭遇,如何在反省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成为一个与原先不同的人。在起步阶段,艾理斯建议研究者首先一边回忆自己的遭遇,一边写下笔记(当然,研究者也可以在意义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就做笔记。但是,正在经历危机的人一般很难有足够的时间、精力、诱因去写笔记)。依据回忆写下笔记之后,暂时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编排笔记是最可行的方式。接着,研究者可以选取重大事件作为故事的主要结构,然后在主要结构中一点一点地添加故事的细节。每次添加一些细节之后,最好隔日再重读自己写过的部分,若有新想起的回忆,可以立即加入故事之中。研究者必须切记自己是在“创造”故事,而不是设法“再现”(represent)过去的经历(Ellis, 1999:675, 2004:117; Ellis & Bochner, 2000:751)。

“情绪回忆法”(the method of emotional recall)是艾理斯用来回想事件细节的一种技巧。她将自己放回到过去的一个场景,让自己再度沉浸于当时的情绪,这些情绪会让她想起许多事件的细节。不过,艾理斯强调:研究者还必须学会从当时的情绪中脱出,如此才能从社会结构的视角分析自己的经历(Ellis, 1991, 1999:675, 2004:118; Ellis & Bochner, 2000:752)。

一个人越了解其他人,就越能够了解自己。同样地,一个人越了解自己,也就越能够了解其他人。因此,在一部分的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作品中,研究者不仅仅探索自己的故事,同时也与其他人交流彼此的故事。创造这一类作品的常用方法包括:反身式访谈(reflexive interview)、互动式访谈(interactive interview)、合作叙事(co-constructed narrative)。“反身式访谈”的主要焦点是受访者的故事,但是研究者在访谈时的想法和感受也是重点。研究者会在刻画受访者叙事过程的文字中穿插自己的故事,例如:自己进行此项研究的原始动机和预设知识是什么?这些原始动机和预设知识如何被用来解读受访者的故事?在访谈的过程中,自己想起了哪些个人遭遇,经历了怎样的情绪波动以及认知转变?“互动式访谈”经常被用在研究者与受访者对于研究主题都有过亲身体验的情况(例如:饮食失调)。研究者与受访者在对话的过程中分享各自的经历、逐渐建立同舟共济的信任感、促成越来越深刻的相互了解与自我认识。“合作叙事”是一种让研究者与其亲人共同面对意义危机事件、巩固亲密关系的方法。首先,研究者与其亲人一起选定某个事件(例如:意外怀孕,以至于选择堕胎)。然后,研究者与其亲人分别写下各自对于此一事件的诠释。最后,研究者与其亲人互相阅读对方的诠释,并且经由沟通而形成对此一事件诠释的共识(Ellis, 2004:61-69, 71-77; Ellis & Bochner, 1992; Ellis et al., 1997)。

为了让作品能够鲜活地展示研究者的生命体验并且成功地唤起读者的情绪共鸣,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需要借用一些小说写作的技法,例如:安排不同的角色进行对话、陈述作者内心的独白、设置事件发生的场景、描写人物的特征、刻画动作的细节、设计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在叙述某一事件时插入片段的回忆以制造对比的效果等。这些技法能够带领读者进入故事之中,特别是进入作者的思想、情绪及行动,让读者设身处地地感受作者的遭遇(Ellis, 1999: 676, 2004: 141, 365-367; Ellis & Bochner, 2000: 752)。

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研究者的某些生命转折事件是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有别于自传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研究者以自身的经历为具体案例,将其与受访者的遭遇以及既存的理论文献进行比较,从而揭示研究者面临的某些塑造与限制人的文化模式与社会结构(Ellis et al., 2011: 276)。艾理斯认为分析的方法可以被区分成两大类:以叙事为分析(narrative analysis)、对叙事进行分析(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

“以叙事为分析”意指述说故事本身就是一种分析行为。当研究者说出一个故事时,他(她)就已经对一系列经验进行了捡选、编排、赋予意义。因此,一个好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分析成果。“对叙事进行分析”则是把故事内容当成资料,并且对资料进行理论分析。这比较接近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方式。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研究者往往会以不同的比重组合两种分析方式。有些研究者会先说一段自己的故事作为背景,然后转向以理论分析受访者和自己的故事,并且以后一种分析方式为重。有些研究者则先回顾某些理论概念,然后述说自己的故事,最后再对既存的理论概念进行质疑并提出新的概念,但是仍然以说故事为主。还有些研究者喜欢将自己的故事与理论讨论穿插混合为一体(Ellis,2004:195-199)。

前面提到的各种方法和技巧只是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手段而已。通过这些手段,研究者试图在作品中揭露自己的脆弱面,然后完成自我的治疗与重建。自我探索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作。艾理斯认为:许多社会学研究者既难以深刻地挖掘自己的感受,也无法清楚地洞察自身所处的环境。如果要进行真诚的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研究者就必须打开心中的恐惧、迟疑和伤痛。这些恐惧、迟疑和伤痛往往会让研究者感到难以面对。但是,惟有敢于正视它们的研究者,才能在艰苦的探索过程中找到化解和超越它们的途径。也惟有愿意揭露作者的脆弱面并且展示作者的自我疗愈过程的作品才能唤起读者发自内心的感动与共鸣,传递有助于读者安顿生命的智慧(Ellis,1999:671-672、675,2004:138;Ellis & Bochner,2000:738、752)。

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特殊的操作方法使得研究者必须处理比传统的写实主义民族志更加棘手的研究伦理问题。在传统的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进入田野获得资料,然后离开田野回到自己的专业工作中。尽管有若干研究伦理的考虑,但是研究者主要的忠诚对象不是田野中相遇的人群,而是学术社群里的同行。撰写研究报告时,研究者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扩展社会学的知识以及如何在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田野调查只是研究者工作的一部分。研究者并不致力于与田野中相遇的人群一起奋斗、一起过生活。研究者的个人生活与学术工作在原则上是分开的。反之,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起点是研究者的个人经验,然后从个人经验延伸到与之相关的社会脉络。研究者的学术工作与个人生活完全交织在一起。当研究者述说自己的故事时,他(她)不可避免

地会谈到周围的亲人、邻居、朋友、同事等。这些人的身份很可能因此而显现在读者的目光之下,即便他们并未同意暴露身份。抑或,他们可能同意公开身份,却不真正清楚公开身份的意义与后果。所以,采用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研究者必须面对特殊的伦理问题——关系伦理(relational ethics)(Ellis,2007a:9-10、13-14;Ellis et al.,2011:281)。

“关系伦理”要求研究者发自内心地重视人与人之间的长期关系。研究者应该对出现在自己故事中的其他人负起怎样的伦理责任?研究者如何能够以人性化、不剥削的方式与周围的人相处,同时又说出复杂、深刻、发人深省的故事?艾理斯指出:面对这些问题时,没有固定的法则可让新手遵循,她惟一能做的就是分享多年来自己从事研究的实践经验(Ellis,2007a:5、14,2009a)。

在《“还有生还者”:说一个关于突然死去的故事》一文中,艾理斯讲述她面对弟弟死于空难的过程(Ellis,1993)。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纪念亡弟,让自己能够坦然面对这段突发的变故,所以艾理斯呈现的是死者的正面特质。她认为自己的弟弟如果地下有知,会很乐意看到姐姐以这种方式纪念他。然而,除了弟弟之外,艾理斯还必须非常谨慎地处理出现在故事里的其他家人,并且顾及到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感受。事实上,虽然多数家人对这个故事表示欣慰,艾理斯的母亲和哥哥却因为不想被重新唤起当时的悲痛,而拒绝阅读这篇文章(Ellis,2007a:14)。

在《谈论死亡:一个简短的民族志故事》一文中,艾理斯刻画自己与一位爱滋病末期朋友在一家昏暗的小餐厅短暂地谈论病情与生活的经过(Ellis,1995b)。经由反思两人失败的交谈以及自己强烈的负面情绪,艾理斯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将生与死划分成两个世界,这使一般人很难面对将死的病人。艾理斯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未征求这位朋友的同意,因为她认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打扰朋友走向死亡的过程是不符合伦理的。然而,在这位朋友过世之后,艾理斯得到了朋友伴侣的同意将这篇文章发表。这位过世朋友的伴侣很喜欢艾理斯写的故事,并且要求她在故事中使用真实的姓名来纪念死者(Ellis,2007a:14)。

撰写《最后的协商:一个关于爱、失去和慢性病的故事》一书使艾理斯面临非常困难的伦理抉择。艾理斯在丈夫生命结束前一年开始写笔记,录下两人的交谈。有时候,她的丈夫也参与谈论她的写作、自己的病情以及生病的社会学意涵。但是,在丈夫生前,两人都不清楚艾理斯将以什么形式和内容来呈现最终的作品。艾理斯在丈夫死后才开始

写书。一方面她为了进行自我治疗以及自我重建而书写,所以书中揭示了许多关于两人性格的细节,包括:缺陷、失望、弱点、坚强、睿智、成就;另一方面她也希望维持对丈夫的忠诚,并且设法保护出现在故事中的主角和配角,因此艾理斯在力图坦率地呈现故事的同时,也于必要的时候删除或修改一些场景,塑造某些虚构的角色以隐蔽他们的身份。此书出版之后,虽然大部分的读者认识到两位主角互动的复杂性,仍有部分读者以为艾理斯贬低了自己的丈夫,更有一些读者表示不喜欢书中两位主角的性格(Ellis,2007a:14-17)。

艾理斯还曾经把照顾年迈母亲的体验写成两篇期刊文章。在《与母亲的关系》一文,艾理斯描写自己在一家医院的病房中照顾母亲时感受到的母女之间血浓于水的爱(Ellis,1996)。对她而言,照顾母亲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恩赐。由于文章中提到母亲的身体隐私(例如:疤痕、瘀青、松垮的皮肤、下垂的乳房、腹泻),艾理斯一直不情愿让母亲知道自己写了这篇文章。一方面她担心母亲无法理解自己为何在文章中提到这些身体的细节;另一方面她心中也认为母亲不可能有机会读到这篇登在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然而,未经母亲同意就发表这篇文章让艾理斯始终心怀不安。于是,她后来又写了《与母亲一起/与孩子一起:一个真实的故事》(Ellis,2001)。这篇文章描写她在母亲家中协助母亲完成睡前准备的过程。为了弥补上次的愧疚,艾理斯向她的母亲朗读了这篇文章的草稿,并且获得母亲对这篇文章的赞赏。可是,艾理斯在朗读草稿时刻意略过了一些描述母亲老迈身躯的形容词。她担心这些词汇可能会伤害母亲的自尊心,也担心自己的文字会破坏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最终,艾理斯把自己朗读文章草稿时的顾虑和结束朗读后的伦理反思也加入了这篇文章,以便读者体会关系伦理的复杂性(Ellis,2007a:18-19)。

在《与“真正的美国人”一起在家:2008年总统选举期间跨越城乡与黑白划分的沟通》一文,艾理斯描写奥巴马竞选总统期间自己与山村新家的邻居之间因为歧视黑人的争论而导致的紧张关系(Ellis,2009b)。艾理斯与第二任丈夫在美国东南部的一个偏远山村购置了第二个家。选择于此安家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小山村与艾理斯幼时成长的环境类似,使她倍感亲切。可是,在享受村民的友善与关照的同时,村中一些关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取向的保守价值也让艾理斯心中充满了挣扎。一方面,由于自身的成长背景,艾理斯可以理解村民为何有

这样的世界观；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大城市中的知识分子，现在的艾理斯对这些保守价值早已深恶痛绝。艾理斯书写自己与新邻居的紧张关系，就相当于反省现在的自己与幼时的自己的关联，以及厘清未来的自己在山村中的定位。然而，描写邻居的种族歧视行为很可能会恶化艾理斯与邻居甚至整个山村的关系。经过再三考虑，艾理斯将故事的焦点放在种族歧视这一态度，而隐匿相关地点与人物的名称，并且加入一些虚构的情节使故事中人物的实际身份更难被指认。艾理斯表示：这个故事并没有交给邻居读过，匿名的手法也不能保证故事中人物的身份永远不会被指认，但是，基于正义感，她还是决定发表这个故事，也准备好承担此故事可能引发的后果（Ellis, 2009a, 2009b: 732）。

以共同创作的方式撰写故事可以减轻研究者对故事中其他人的伦理责任，因为故事中的主角都成了故事的作者，都对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有一定的控制权。即便如此，作者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必须注意的伦理议题。在《互动式访谈：讨论情绪经验》一文，艾理斯与她的两位博士研究生共同针对贪食症引发的情绪进行多次的深度交流（Ellis et al., 1997）。艾理斯强调：虽然三位作者对故事的内容都有控制权，但是教授与博士研究生之间的权力关系是不均等的。因此，艾理斯特意设计了回避的机制，让两位研究生有一些机会于教授不在场的情况下互相交流（Ellis, 2007a: 20 - 21）。在《讲述及演出个人的故事：选择堕胎时遭遇的束缚》一文，艾理斯与第二任丈夫利用“合作叙事”创作了一个剧本（Ellis & Bochner, 1992）。此剧本的内容是他们两人交往初期意外怀孕及选择堕胎的经历。在作品中揭示自己的堕胎决定使艾理斯与丈夫面临强烈的道德争议。有人提醒艾理斯和她的丈夫不要在课堂上使用这篇文章，因为这样做可能会让坚决反对堕胎的学生难以与老师相处。另外，艾理斯也表示：如果将来有了孩子，她与丈夫可能有责任避免孩子发现这个故事（Ellis, 2007a: 21 - 22）。

四、艾理斯研究方法的批评与价值

艾理斯的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作品涉及了她的生活体验的各个面向。除了前文提到的丧弟、探望重病朋友、丧偶、照顾母亲、与邻居争论种族主义、饮食失调、堕胎之外，她还探讨了跨种族恋情（Ellis,

1995c)、轻微的身体缺陷(Ellis, 1998)、911 攻击后遗症(Ellis, 2002b, 2002c)、领奖感受(Ellis, 2003)、卡特里娜(Katrina)风灾反思(Ellis, 2007b)、学术成就导致的压力(Ellis, 2011)、面对同事与朋友凋零以及自身老化(Ellis, 2013)等。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使艾理斯的学术工作与她的个人生活几乎融为一体。

艾理斯的研究方法从来就不缺少批评者。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者指责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不科学。他们认为研究者的自身经历不能作为研究的合法资料。他们批评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的研究程序不够严格,书写格式不符合常规(亦即经常看不到明显的文献回顾、理论、假设、分析)(Atkinson, 2006; Charmaz, 2006; Delamont, 2009; Goode, 2006)。后结构主义者认为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沉迷于创伤疗愈。他们要求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增强解构、批判、怀疑的色彩(Clough, 2000; Gannon, 2006; Jackson & Mazzei, 2008)。文学研究者嘲讽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研究者是二流的作家。他们责备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研究者过于偏好书写真正发生过的故事,所以作品中欠缺足够的文学想象力(Gingrich-Philbrook, 2005; Moro, 2006)。然而,如艾理斯所言:这些批评者有其各自认同的学术目标;因为他们各自追求的目标与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试图达到的目标都不相同,所以即便逐一反驳他们的批评,也不可能促使大家达成共识;既然大家坚持的目标都不相同,那么比较妥当的做法不是强行统一分歧的目标,而是允许不同的目标在学术界共存(Ellis, 2009c: 372 - 373)。

本文以为:艾理斯研究方法的首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社会科学研究取向。对于大多数社会学研究者而言,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破坏性的”哲学。后现代主义拒绝传统的认识论,反对常规的研究方法,嘲讽一切关于客观事实的断言。因为它太过挑衅,所以大多数研究者虽然或多或少地承认它的某些批评,却又不得不远离这些批评,继续从事着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Alvesson, 2002: 1 - 4)。与固守传统的研究者不同,艾理斯不仅仅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场危机,还抓住了它带来的创新机会。如前文所述,在勇于接受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同时,艾理斯发展了另类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向,赋予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截然不同的理据、目标与评判标准,详细阐述其操作方法以及伦理顾虑,并且引导学生和同事们运用此方法进行经验研究。

面对国内正在逐步确立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霸权(hegemony),艾

理斯的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不仅能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还能刺激中国学者反思与深化自身对于西方诸多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认识。在西方的社会学界,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黄金时代早已终结。虽然由于学术体制(机构、经费、期刊、人员)的延续性,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依然占据西方社会学的大半江山(Prus,1996:Chap.1),但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实证主义已经失去哲学家们的支持(Halfpenny,1992:120)。由于中国社会学推迟发展的现实,国内许多学者致力于学习西方社会学的主流。然而,这种学习往往只触及技术表层而缺乏思想底蕴。就社会学研究方法而言,研究者们往往偏重于模仿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操作步骤”而很少注意到这些步骤背后的“哲学理据”早已过时,更别提去追溯实证主义哲学兴起的理由和衰落的原因。作为一种新发展的研究方法,艾理斯的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从心路历程、哲学理据、学术目标、评判标准、操作方法乃至伦理顾虑都还清晰易辨。情感唤起式自传民族志是西方诸多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具体而微的分支。它可以提醒国内的学者们:社会学研究方法与哲学是密不可分的;学习一种研究方法的操作步骤,也必须认识这些操作步骤背后的哲学理据(卢巍翎,2013)。

参考文献:

- 卢巍翎,2013,《质性研究法与社会科学哲学——以社会学中的民族志为例》,《思想战线》第2期。
- 彭玉生,2010,《“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第2期。
- Alvesson, M. 2002, *Postmodernism and Social Research*. 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
- Anderson, L. 2006, “Analytic Autoethnograph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5(4).
- Anderson, L. & M. Austin 2012, “Auto-ethnography in Leisure Studies.” *Leisure Studies* 31(2).
- Atkinson, P. 2006, “Rescuing Autoethnograph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5(4).
- Charmaz, K. 2006, “The Power of Nam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5(4).
- Clough, P. 2000, “Comments on Setting Criteria for Experimental Writing.” *Qualitative Inquiry* 6(2).
- Delamont, S. 2009, “The Only Honest Thing: Autoethnography, Reflexivity and Small Crises in Fieldwork.” *Ethnography and Education* 4(1).
- Ellis, C. 1986, *Fisher Folk: Two Communities on Chesapeake Bay*. Lexington, 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 1991, “Sociological Introspection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 *Symbolic Interaction* 14(1).
- 1993, “‘There Are Survivors’: Telling a Story of Sudden Death.”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4).

- 1995a, *Final Negotiations: A Story of Love, Loss, and Chronic Illne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1995b, “Speaking of Dying: An Ethnographic Short Story.” *Symbolic Interaction* 18(1).
- 1995c,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Seeing Black and White in a Small Southern Town.” *Qualitative Inquiry* 1(2).
- 1996, “Maternal Connections.” In C. Ellis & A. Bochner (eds.), *Composing Ethnograph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 1997, “Evocative Autoethnography: Writing Emotionally about Our Lives.” In W. Tierney & Y. Lincoln (eds.), *Representation and the Text: Re-framing the Narrative Voic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1998, “‘I Hate My Voice’: Coming to Terms with Minor Bodily Stigmas.”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4).
- 1999, “Heartful Autoethnography.”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9(5).
- 2001, “With Mother/with Child: A True Story.” *Qualitative Inquiry* 7(5).
- 2002a, “Being Real: Moving Inward toward Social Change.”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15(4).
- 2002b, “Shattered Lives: Making Sense of September 11th and Its Aftermat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1(4).
- 2002c, “Take No Chances.” *Qualitative Inquiry* 8(2).
- 2003, “Honoring Love in Academia.” *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 6(2) (online) (<http://acjournal.org/holdings/vol6/iss2/ellis/ellispath.htm>).
- 2004, *The Ethnographic I: A Methodological Novel about Autoethnography*. Walnut Creek, CA: AltaMira Press.
- 2007a, “Telling Secrets, Revealing Lives: Relational Ethics in Research with Intimate Others.” *Qualitative Inquiry* 13(1).
- 2007b, “Katrina and the Cat: Responding to Society’s Expendables.” *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7(2).
- 2009a, “Telling Tales on Neighbors: Ethics in Two Voic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1).
- 2009b, “At Home with ‘Real Americans’: Communicating Across the Urban/Rural and Black/White Divides in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9(6).
- 2009c, “Fighting Back or Moving On: An Autoethnographic Response to Critic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3).
- 2011, “Jumping On and Off the Runaway Train of Success: Stress and Committed Intensity in An Academic Life.” *Symbolic Interaction* 34(2).
- 2013, “Crossing the Rabbit Hole: Autoethnographic Life Review.” *Qualitative Inquiry* 19(1).
- Ellis, C. & A. Bochner 1992, “Telling and Performing Personal Stories: The Constraints of Choice in Abortion.” In C. Ellis & M. Flaherty (eds.), *Investigating Subjectivity: Research on Lived*

- Experience*. Newbury Park, CA: Sage.
- 2000, “Autoethnography, Personal Narrative, Reflexivity: Researcher as Subject.” In N. Denzin & Y. Lincoln (eds.), *Th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i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Ellis, C. & E. Weinstein 1986, “Jealousy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3).
- Ellis, C., C. Kiesinger & L. Tillmann-Healy 1997, “Interactive Interviewing: Talking about Emotional Experience.” In R. Hertz (ed.), *Reflexivity and Vo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Ellis, C., T. Adams & A. Bochner 2011, “Autoethnography: An Overview.”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36(4).
- Gannon, S. 2006, “The (Im)possibilities of Writing the Self-writing: French Poststructural Theory and Autoethnography.” *Cultural Studies ↔ Critical Methodologies* 6(4).
- Gingrich-Philbrook, C. 2005, “Autoethnography’s Family Values: Easy Access to Compulsory Experiences.”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25(4).
- Goode, E. 2006, “Mixing Genres: It’s a Floor Wax and a Whipped Topping.” *Symbolic Interaction* 29(2).
- Halfpenny, P. 1992, *Positivism and Sociology: Explaining Social Life*. Albershot: Gregg Revivals.
- Jackson, A. & L. Mazzei 2008, “Experience and ‘I’ in Autoethnography: A Deconstructio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1(3).
- Mead, G. 1934,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oro, P. 2006, “It Takes a Darn Good Writer: A Review of *The Ethnographic I*.” *Symbolic Interaction* 29(2).
- Prus, R. 1996,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Ethnographic Research: Intersubjectivity and the Study of Human Lived Experience*. Albany,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作者单位: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 罗琳